

中國社會的潘多拉盒子 被打開了嗎？

——對余華《兄弟》的批判性思考

● 李琮敏

在《兄弟》裏面，余華把文革否定為一個「瘋狂的、遏制本能的、淒慘的」政治事件，可以說《兄弟》跟之前的作品有着不同的構思。導致這種轉變的原因跟余華在對待過去事件的記憶方式上發生了某種轉變有密切的關係。



余華：《兄弟》，上、下部（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5-2006）。

熟悉余華1990年代長篇小說的讀者，對於他最近的作品《兄弟》也許會產生很大的困惑^①。尤其是，如果期待像《活着》或者《許三觀賣血記》裏一樣，主人公在絕望的情況下通過記憶和溫情找回人生的意

義，並且對世界和他人持以寬容這種故事的話，困惑感一定是加深了。《兄弟》中的哪一點讓讀者疑惑不解呢？

在《兄弟》之前的作品裏，余華注重的其實並不是對現代史的詮釋。那些作品儘管也描寫了文化大革命，但這只不過是富貴和許三觀的人生歷程中的一個事件，讓他們形成對人生的成熟態度罷了。與之相反，在《兄弟》裏面，余華把文革否定為一個「瘋狂的、遏制本能的、淒慘的」政治事件，從這個角度上來看，可以說《兄弟》跟之前的作品有着不同的構思。筆者認為，導致這種轉變的原因跟余華在對待過去事件的記憶方式上發生了某種轉變有密切的關係。

人類的記憶實際上並不一定是真正發生的事情，它只不過是通過一個人的人生經歷和自我價值而折射出來，並根據當代的問題意識進行再構。這與克羅齊 (Benedetto Croce) 所謂的「所有的歷史就是現

代史」這一觀點是相通的。對於過去的歷史，余華的記憶方式也應該從這個角度去解釋。那麼，要解讀《兄弟》，最關鍵的就在余華對現實中國的改革開放持怎樣的態度上。在這樣的問題意識下，本文以《兄弟》中的改革開放時代為中心，針對余華的記憶方式和寫作風格上出現的幾個問題，以及余華寫作風格轉變的可能性進行一些探討。

一 拉伯雷和余華

陳思和在〈我對《兄弟》的解讀〉一文中評價余華的《兄弟》衝擊了同時代的文壇，正如巴赫金(Mikhail M. Bakhtin)在《拉伯雷的創作與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時期的民間文化》中提到的一樣：即拉伯雷(François Rabelais)的《巨人傳》(*Gargantua et Pantagruel*)繼承了與文藝復興以來古典文學的潮流完全不同的民間文化傳統，創造出怪誕的現實主義，這跟余華的《兄弟》是類似的^②。對於這點，余華在《余華的〈兄弟〉作家筆記》裏表示同感說^③：

像《兄弟》下部的情况是完成後才發現是用拉伯雷的《巨人傳》方式寫的。這也是看了復旦大學陳思和先生的文章以後才知道的。以前讀《巨人傳》這部作品後，跟小說家格非說，我也要寫一部這樣的作品，現在看來實現了。

只要是第一次讀拉伯雷的小說，不管是誰都無法預測故事的發展方向，小說裏對淫穢的內容無止

境露骨地描寫，以及形而上學的東西和各種各樣的語言文字遊戲等等，這些混亂的創作方式都會讓人對他的小說產生困惑。拉伯雷的小說對那些習慣於古典文學的平衡和節制，以事件為中心來展開故事情節，以及習慣於寫實性表現的讀者來說，無疑是一種打擊。小說接連不斷地用無節制的語言和奇怪的形象相結合，對性交、生產和排泄的場面都毫不避諱地加以描寫。巴赫金認為拉伯雷小說所擁有的這種特徵和以嘉年華(carnival)為代表的群眾盛會有着直接的關係。嘉年華是一種如宗教性慶典和國家的慶祝典禮一樣的民間盛會，它區別於那種按照各自的階級和社會身份地位參與的封閉性的官方慶典。嘉年華是對傳統的權威和價值體系的諷刺和嘲弄，是從宗教法則、身份制約、社會規範和禁忌中解放出來，任何人都可以共同參與的民間慶典。嘉年華世界並不是一個藐視人類本性，強調禁欲和苦修的淨化世界，反而是一個不管它有多醜陋，也不迴避人類本來面目的世界，同時又是一個承認現世的人生價值，讓那些樂觀肯定的評價來支配的世界。巴赫金認為這種繼承民間文化傳統的拉伯雷小說描寫的是宇宙和社會、物質和肉體密切相關的世界^④。

陳思和評價道：余華的《兄弟》以巴赫金理論為基礎，小說中偷窺女廁所、淫亂宣洩、露骨的性描寫、處女美人大會、人工處女膜欺騙事件等都脫離了一般的文化習慣，以新的面貌全面登場。特別是主人公李光頭超越常識的各種惡行，不怕暴露出他低俗的拙夫形

陳思和評價道：從文學史的角度來看，《兄弟》並不是一部迎合商業性腐化的作品，而是反映了改革開放以後，被物質和肉體支配的中國當代社會的黑暗面，應該理解為是一部以新的文學敘事方式來創作的作品。

《兄弟》中的民眾並不是依照人類的本性來生活的主體，而是捲入物質與肉體的欲望裏淪落為失去生氣的觀眾。這種民眾不能再創造拉伯雷式意義的嘉年華世界，他們可以說跟魯迅式意義的旁觀者類似。

象，體現出他對當代社會無意識的貪念之色，這一點正具有了拉伯雷式的創作風格。陳思和還評價道：正因為這些破例，《兄弟》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在一直受傳統文學和啟蒙文化感染的當代文壇上引起了巨大的反響。但是從文學史的角度來看，它並不是一部迎合商業性腐化的作品，而是反映了改革開放以後，被物質和肉體支配的中國當代社會的黑暗面，應該理解為是一部以新的文學敘事方式來創作的作品^⑤。

從陳思和的主張以及余華的同感來看，我們在《兄弟》裏很明顯地可以看出余華借用了拉伯雷的創作方式，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因此對這種創作方式感到困惑或者厭惡的中國批評家們，和拉伯雷所處時代的批評家們一樣，對之表示出強烈的反感，並不從文學的角度予以承認。其中主要的原因是《兄弟》把民間社會中流傳的荒唐事件，沒有進行任何文學上的修飾就直接地敘述出來，而且它不以實際為基礎，對故事情節進行了誇大描寫^⑥。

即不提這種否定的立場，在解釋《兄弟》與拉伯雷作品相似並具有「怪誕的現實主義」的真正意義之前，有必要首先指出的是，拉伯雷作品揭露的是人類的本性和物質欲望受到壓抑的中世紀的虛偽性，描寫的是存在於禁欲之外的具有民眾喜劇性的生氣蓬勃的嘉年華世界。但是，《兄弟》裏的改革開放時代和禁欲的中世紀不同，它所反映的是民眾瘋狂地渴望物質和肉體的狂歡季節^⑦。以文革時代為背景的《兄弟》上部，不管是描寫偷窺女廁所

的事件，還是描寫李光頭賣「屁股故事」來換取食物的本事，以及劉鎮男人們的性欲，某種程度上都給讀者提供了笑料，對欲望的壓抑發揮了緩解的作用。取得這樣的效果可能就是由於《兄弟》上部和壓抑的文革保持着緊張關係。但以改革開放時代為背景的《兄弟》下部，描寫的劉鎮人對日本垃圾西裝的傳言、李光頭旺盛的性欲、處女美人大會、露骨的性關係、處女膜欺騙事件，以及李光頭和林紅之間的不倫等，不但沒能發揚嘉年華的生機和狂歡的氣氛，反而只留下了苦澀的冷笑。這些描寫雖然很明顯地摻和着狂歡時代的虛偽性，但它並不是從專制權力的壓抑中解放出來的故事，只不過是順應着時代的潮流，把一些醜聞戲劇性地表現出來罷了。因此，《兄弟》中的民眾並不是依照人類的本性來生活的主體，而是捲入物質與肉體的欲望裏淪落為失去生氣的觀眾。這種民眾不能再創造拉伯雷式意義的嘉年華世界，他們可以說跟魯迅式意義的旁觀者類似^⑧。

那麼，為甚麼余華雖然追尋拉伯雷式的寫作，而只能敘述與其相反的故事呢？為了找出這個原因，讓我們走進《兄弟》中的改革開放時代吧。

二 李光頭成功神話的內幕

讓李光頭成為劉鎮首富的改革開放是把國家獨佔資產的所有權和使用權相分離，是國家持有所有權

而將使用權轉換給市場的一個過程。但在建立公平的市場制度的情況下，國有資產的使用權以特惠的形式分配給了和國家權力合作的個人，個人在取得了使用權以後實際上就走向了私有化。搭上國有資產市場化順風車的人就可以在短時期內獲得龐大的利益，特別是在國家主導市場化的情況下，只要他利用國家權力，或者接近那些持有國家權力的人，就可以更加容易地達到致富的目的。

改革開放以後，劉鎮裏致富的人們也都是積極參與到這種市場化過程中而獲取利益的。仔細看劉鎮的改革開放過程，最早富起來的不是李光頭，而是像童鐵匠、張裁縫、關剪刀、余拔牙、王冰棍、點心店的蘇媽等個體戶。他們是在李光頭創業之時的投資者，在改革開放初期最先掙到錢的一幫人。從劉鎮的個體戶協會主席童鐵匠給李光頭投資了4,000元這件事上，我們可以看出，童鐵匠就是當時象徵着有錢人的「萬元戶」。

作為後起之秀的李光頭，他開始創業的時期就是「下海」高峰期。李光頭搭上「下海」這趟順風車，放棄了在福利工廠的工作。最初創辦的服裝廠失敗後，李光頭使出了他出類拔萃的商業手段，從而坐上了「廢物大王」這個位置，緊接着他又進口並內銷了日本的垃圾西裝，之後以號稱「中國資本主義之花」的私營企業家身份，完成了企業發展所需資本的積累。這裏所說的私營企業家指的是擁有八名以上僱員的企業家，他們使出多種商業手段，有

的趁着當時通訊不發達的環境，利用地域之間商品交換和流行的差異來獲取利益，有的直接經營現代化工廠生產物品來堆積財富。

在李光頭之前創業的劉鎮個體戶們不能從小規模自營業的範圍中擺脫出來；但與之相反，李光頭卻充分地利用了改革開放的優點，通過國內外的交易，擴張了自己的事業。可是李光頭成為劉鎮首富的主要原因還是由於他跟縣長陶青聯手，獨佔了劉鎮城市開發市場。事業的成功致使李光頭成為劉鎮的寵兒，還被選為縣人民代表常委，從此，為了建立一個新劉鎮，他丟掉了私營企業家的身份，搖身一變成為政府的一個合作夥伴。之後，從劉鎮的道路建設到公寓樓房建設，從百貨公司、桑拿、餐廳、生產流通、進出口到火葬場和墓地等方面，李光頭獨佔了劉鎮所有的市場，陡然成為一個操縱城市GDP的重要人物。

實際上，揭開改革開放以後急劇發展的私營企業家的內幕，我們可以發現他們成功的秘訣大部分都是先通過開發房地產，然後獲得了一個龐大的時勢差額。中國土地依然是屬於國家所有，那些有開發意向的企業先向政府提交土地開發計劃書，在取得政府授予的土地使用許可權以後才能進行土地開發。改革開放以前，中國房地產業並不發達，政府為了促進開發，獎勵房地產投資，允許私營企業介入。因此私營企業趁着這個大好時機，可以低價買下一塊好的地皮，取得這塊地皮的使用權，然後拿使用權到銀

如果余華的創作目的是描寫劉鎮那個地方形成貧富間隙的原因，也許他還應該描寫李光頭和陶青如何助長了社會不平等。但《兄弟》中對於這個問題的描述遠不及對李光頭資本積累過程的描述，對形成巨大貧富間隙的本質性原因沒有提出質問。

在人口不過幾萬的縣級城鎮裏，誕生像李光頭這樣的首富，實際上是脫離現實的，也只能出現在小說裏。可以看出，作者不顧這一點而設定了劉鎮這個舞台，有着特定的意圖。

行進行貸款抵押，獲取投資資本，從這些特惠政策中獲得巨大的差額利潤。同時，急速的城市化和龐大的住房需求以及各種開發區的建設，也使私營企業家以公開和非公開的方式與政府勾結，享受着各種的特惠。

在李光頭以私營企業家的身份急劇成長的過程中，房地產開發特惠政策也起了關鍵性的作用。由於積極利用了自身的商業手段和政府的特惠，李光頭才會不同於劉鎮其他個體戶而成為巨富。在1980年代中後期，國有財產的市場化、民營化進入軌道以後開始深化，這種政經的鏈接過程成為導致巨大貧富間隙的根本原因。

改革開放初期，經濟活性化的成果在全民中間取得了再分配。但由於市場制度的空白和國有財產不公平分配的加速，深化了地域之間、階層之間的貧富間隙，妨害了社會穩定健康的發展。但是作者對於這一背景只在《兄弟》下部做了簡單的敘述^⑩，李光頭成功神話的這種社會內幕並沒有被揭露出來，作者反而把焦點放在只要有心就沒有辦不到的李光頭的全知全能手段（當然取得權力的特惠也是商業手段之一）上，即歸於個人能力的差異。如果余華的創作目的是描寫劉鎮那個地方形成貧富間隙的原因，也許故事的情節中還應該描寫對李光頭（作為私營企業家）和陶青（作為國家權力的代表）兩人牽起的無形之手如何助長了社會不平等。但《兄弟》中對於這個問題的描述遠不及對李光頭資本積累過程的描述。

還有，對李光頭怪誕行為的描寫都穿插在他成為巨富、創造自己的成功神話以後，以及處女美人大會和他與林紅不倫的關係等上面。小說只不過羅列了李光頭的個人經歷，對形成巨大貧富間隙的本質性原因沒有提出質問。

當然文學故事跟現實情況並不一樣，《兄弟》裏的故事是作者虛構的，在這一點上看，並不需要一定要與中國經濟發展的實際過程相一致。可是，儘管文學故事中重要的不是和實際相一致，但作家再構的故事能否多多少少給讀者一些同感是很重要的。余華也意識到這一點，他指明他的故事不是單純的虛構，而是以改革開放當時成功的企業家們的真實故事為素材的^⑪。

筆者最關注的是在成為劉鎮首富的故事中，有多少是可以讓讀者感到共鳴的文學的真實性。在人口不過幾萬的縣級城鎮裏，誕生像李光頭這樣的首富，實際上是脫離現實的，也只能出現在小說裏。可以看出，作者不顧這一點而設定了劉鎮這個舞台，有着特定的意圖。這與作者對李光頭成功神話的描寫不是社會結構的問題，而是以個人的能力和性格為焦點有關。《兄弟》這部小說被稱為「李光頭傳」^⑫，說明小說是以李光頭式人物的個性塑造為重點，要創造這樣的人物，與複雜且人際關係疏離的現代化大城市相比，像大家族一樣共同生活，並遺留着小農經濟的生活方式的中小城市更為合適。這樣的設定雖然可以輕易刻畫出充滿物質欲望者的個性，但是引起巨大貧富間隙的主犯

李光頭誕生的社會內幕，只能被模糊地處理。這一點和對生活在改革開放陰影下的宋鋼（李光頭的兄長）以及劉鎮人的描寫是相輔相成的。

三 「先富論」的陰影

改革開放以後，李光頭放棄了穩定的工作，走上經商的冒險之路，而宋鋼卻堅守國有企業的「鐵飯碗」，選擇了穩定的生活之路。與順應改革開放的潮流而「先富起來」的一群人不同，宋鋼對提供永遠保障的「單位」深信不疑。對於劉鎮的急劇變化和李光頭的成功神話，他保持了一定的距離，每天仍然騎着「永久牌」自行車上下班。但是以效率性和市場性為優先的改革開放再不允許以平均分配為基礎的穩定生活，所以像宋鋼一樣的多數人失去了自我生存的基礎，陷入了生活的危機。「先富論」本來是期待「炕頭熱了，炕尾自然也熱了」的均富效果，但是國有財產在市場化、民營化的過程中，像李光頭一樣取得「先富」的人只不過是一小部分，因為「特惠分配」使社會資源被這些少數人所佔有，形成了一個獨佔的局面。改革開放以前的全民所有國有財產現在變質為少數人的私有財產，從這個脈絡上看，李光頭成為劉鎮的首富，同時宋鋼因為所依靠的「鐵飯碗」即金屬工廠的倒閉而淪為所謂的「下崗職工」，這些可以說是作者有意的設定^②。

下崗其實跟私有企業中的解僱並不完全一樣。下崗職工不能上班，但所屬單位會給他們提供最低

的生活保障；如果在指定的時間內不能復職的話，這才是真正意義上的被解僱了。這些下崗人員的年齡一般在三十五歲以上，他們要負責一家人的生計，被解僱會讓全家人的生活陷入貧困。下崗不僅僅是失去了工作，沒有了收入，最重要的是失去了國有企業本來所提供的醫保、教育、住房、養老等福利。對於這些原本可以免費享受的福利，下崗職工卻需要自己承擔費用，這對他們來說無疑是不小的負擔。再加上這群人大部分只是接受過中等教育的一般技術人員，對於目前社會上提供的需要專業技術的工作，沒有再被錄用的可能，這一點無疑也加重了他們的負擔。

跟大多數下崗職工差不多，宋鋼也沒有一項特別的專門技術，所以不能找到一份穩定的工作，只能做個臨時工。尤其是在那些走進城市的農民工、闖入大城市的年輕人，以及像宋鋼一樣下崗的勞動者之間，就業競爭是非常激烈的，以宋鋼的條件要找到一份穩定的工作就更不容易了。雖然宋鋼找到了一份在碼頭的工作，但不幸的是他扭傷了腰；之後卻不能在醫院裏好好接受治療，只能在家休養。尤其是到最後他受不了現實生活的折磨，與詐欺犯周遊一起賣起了人工處女膜、陰莖增強丸、豐乳霜等假貨，從中圖利三萬元後回到了家。可是他卻發現，他在外面的這段時間，妻子林紅和李光頭之間卻發生了姦情。小說最終讓宋鋼失去了生存的勇氣，走上了自殺的絕路。

然而，當閱讀《兄弟》的時候，我們會覺得這樣的結果都是宋鋼的

現實中國還沒有具備接受改革開放衝擊的社會安全網，下崗人員會陷入像宋鋼那樣受了傷卻沒有醫療保障以致無法承擔昂貴的醫療費用而不得不放棄治療的處境。宋鋼的悲劇應該跟國家福利制度和社會安全網的缺乏聯繫起來。

儘管文革和改革開放在政治經濟制度上完全不同，但遏制人的本性的那個「狂氣」時代和噴出欲望的「狂歡」時代，在本質上還是一樣的。劉鎮人是在現實與歷史重疊的「巨大間隙」中，並且在除去現實與歷史的變化的「永遠持續」中生活下去。

無能和死腦筋造成的。這跟對李光頭成功的神話是因為其卓越非凡的個人能力的描寫是相對應的。但是，與這個問題緊密聯繫的，是現實中國還沒有具備接受改革開放衝擊的社會安全網，所以失業者只能遭到生存的威脅。下崗人員會陷入像宋鋼那樣受了傷卻沒有醫療保障以至於無法承擔昂貴的醫療費用而不得不放棄治療的處境。所以，宋鋼的悲劇不能只把它看做是個人能力造成的，應該跟國家福利制度和社會安全網的缺乏聯繫起來。

由於這種生活的不穩定，《兄弟》裏所描寫的劉鎮人形象都是以物質與肉體的欲望為先，並且忘卻人生的意義而生活的。在個人只看到自身生存問題的情況下，追求人格的高尚是不可能的。比如林紅無法抵得住李光頭的誘惑，跟他發生姦情，並在宋鋼自殺以後，成為賣淫場所美容院的院長。童鐵匠為了享受性的愉悅，為美容院拉客。李光頭本人熱衷於發洩他離奇的性欲。劉鎮人為了先成為有錢人而不擇手段，他們熱衷於賺錢，只要是能賺錢的事情，不管甚麼都會毫不猶豫。在致富過程中，他們一直生活在這種陰影之下，用性欲的滿足來填補生活的空虛，緩解生活給他們帶來的壓力。

這分明是對人們變成金錢和性的奴隸的現實中國發出的絕望的聲音。但是，這個問題是不是只有跟讓劉鎮人淪為「病者」的社會因素（即公正的市場制度和社會安全網的缺乏問題）一起來思考，才可能達到均衡的反省呢？就算如此，作者還是把劉鎮人描寫得很絕望，是

因為他認為這一點是中國人不變的本性，還是因為他在「先富論」的陰影下找不到出路呢？

四 改革開放，是變身還是持續？

余華在給韓國讀者寫的文章中說道^⑩：

我在《兄弟》中，對巨大的間隙進行了描寫。文化大革命時代和今天的時代間隙是歷史的間隙，李光頭和宋鋼的間隙是現實的間隙。歷史的間隙也就是說一個西方人活四百年才能經歷這樣兩個天壤之別的年代，一個中國人，只需四十年就經歷了。現實的間隙正如前面說的北京男孩和西部地區的女孩，他們雖然是同一時代的人，卻跟生活在不同時代一樣存在着很大的差別。我們的生活就是這樣。我們生活在現實和歷史相重疊的巨大間隙中。

這就是作者通過《兄弟》想要揭露的中國現況。

看看余華所說的中國現況，我們知道，從文革時代走向改革開放時代的過程中，中國出現了政治經濟上的巨大間隙。改革開放以後，社會出現了很多不平等的現象，由此產生了我們可以親眼目睹的階級之間、地域之間的間隙，甚至於兒童未來夢想上的間隙。但是閱讀《兄弟》以後，除了這種巨大間隙以外，我們還可以感覺到跟這種巨大間隙同一性質的「永遠持續」的力量支配着劉鎮這個小地方。儘管文革

和改革開放在政治經濟制度上完全不同，但遏制人的本性的那個「狂氣」時代和噴出欲望的「狂歡」時代，在本質上還是一樣的。還有，儘管劉鎮人在生活上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在順應這個變化，追求現世的價值上，過去和現在是沒有變化的。李光頭和宋鋼雖然在能力和性格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異，但在體現劉鎮的這種社會性質上是沒有區別的。從這個脈絡上看，可以說劉鎮人是在現實與歷史重疊的「巨大間隙」中，並且在除去現實與歷史的變化的「永遠持續」中生活下去。

從中國社會「永遠持續」的角度上看，我們可以想像出作為二十世紀初被魯迅所批判的「永遠的看客」的中國人形象——即把社會的巨大變革變成一經而過的風波，捲入這樣的風波後，忘卻人生的意義，以旁觀者的身份生活的中國人。《兄弟》裏描述的劉鎮人就是流着這樣中國人的血的旁觀者。他們在文革這個狂風暴雨的季節裏，趕走了所謂的「地主」和「資本家」；文革過後，迎來了改革開放的春風，他們又狂熱地追逐金錢，而變成金錢和性欲的奴隸。他們並沒有對文革進行反省，也沒有對改革開放帶來的不平等加以懷疑和指責，為了適應當前的尋金熱風，他們只是保持着一種生存的本能罷了。文革和改革開放並不能改變劉鎮人的生存本能，只不過在改變他們現世的目標上起了點作用罷了。

劉鎮人充滿了好奇心，他們會偷看別人的臥室，樂於摻和到別人的事情中去，但是這並不是他們對別人真正的關心和同情，只不過是

想從別人的不幸中找到一點自我滿足罷了，這就是一個中國旁觀者的心態。像這樣的旁觀者，在《兄弟》的劉鎮裏處處可以看到，他們引導着小說整個情節的發展。尤其是在宋鋼的父親宋凡平死後，大家對其妻子李蘭的唾罵，還有宋鋼失業後，大家對他注視的眼光，都不是同情他們的不幸；相反，作為旁觀者，他們成了讓李蘭和宋鋼陷入窘境兇手的兇手。旁觀者對他人過於好奇的心態其實就是利己主義的頂峰，對他人的不幸抱着事不關己的態度。在劉鎮，這些觀客們說出的醜聞滾滾而來，根本聽不到生氣勃勃和溫馨的故事。

這種「永遠持續」的力量支配了劉鎮，不管掀起多大的風波，都不可能使劉鎮發生徹底的真正意義上的變化。余華除了描寫「巨大間隙」的故事以外，通過《兄弟》想描寫的另外一個故事是不是「永遠持續」呢？這一點可以從《兄弟》這部小說裏，設定了劉鎮這個縣級小城的作者意圖上反映出來。跟之前提及的一樣，劉鎮這個城鎮人口只不過幾萬人，卻出現了像李光頭這樣的大亨，這一點跟想展示改革開放帶來急劇變化的虛構空間是不相符合的。改革開放雖然是從農村的改革和城市周邊的鄉鎮企業的建設開始的，但是政策中心轉移到城市以後就漸漸與改革開放疏遠了；從實際情況來看，大城市比縣級城鎮更適合作為體現改革開放的場景，可是作者卻設置了劉鎮，肯定是另有意圖的。這個意圖正好符合了余華所說的：「《兄弟》裏描寫的群眾的形態是轉型中的中國地方小城市的模

劉鎮人充滿了好奇心，他們會偷看別人的臥室，樂於摻和到別人的事情中去，但是這並不是他們對別人真正的關心和同情，只不過是想從別人的不幸中找到一點自我滿足罷了，這就是一個中國旁觀者的心態。

余華選擇了與以往不同的寫作方式。他通過所謂「狂歡」敘事，不但描寫了熱衷於對物質和性欲的渴求，而且讓生活裏的「中庸」不復存在，讓人們眼前看到的只有自身的生存，對家族和他人的一點點溫情也給拋棄了。

樣。」^④也就是說，要展開「永遠持續」的故事的話，像劉鎮這樣的小城市是最適合的。

但是這一點卻讓余華陷入了進退兩難的局面，因為改革開放以後形成的巨大間隙可能會被支配着劉鎮的永遠持續的傳統力量所遮掩。也就是說，中國人的不變的旁觀者本質面臨了社會矛盾，最終會把引起巨大間隙的根本原因歸結到中國人的本性上。生活在改革開放時代的《兄弟》裏的劉鎮人，正如生活在封建社會的《阿Q正傳》裏的未莊人，作者為了改造中國人的國民性，不得不回歸到近代啟蒙主義者的身份上去。那麼，在像劉鎮一樣的封建習俗(habitus)、社會主義習俗，以及資本主義習俗相並存的改革開放時代的中國，用改造國民性這個近代的方法可以為之找到出路嗎？

五 《兄弟》，是冷笑還是諷刺？

余華在《余華的〈兄弟〉作家筆記》裏面這樣說自己的作品世界^⑤：

進入90年代以後，我的長篇小說的創作方法發生了變化。那是我對小說中主人公的態度發生變化的原因。在過去我是以一個作家甚麼都知道的態度去創作的。我覺得像神一樣知道所有的事情的話，就可以創造所有的東西。但是進入90年代後，我忽然發現小說中的人物都有着自己的聲音。他們是知道說出自己想說的話的。所以我開始讓小說

人物一邊走路一邊自言自語，放棄了統領和支配這些人物。以前我是個獨裁者，但是當我選擇了這種敘事方式以後，我變成了一個民主主義者。

站在這個立場上，對《兄弟》與他以往的小說不一樣的評價，余華的回答是：這不是自己小說觀的改變，而是小說中的主人公李光頭所造成的^⑥。

在《兄弟》中的改革開放時代，的確沒有余華特有的敘事手法(在極端的情況下也不會陷入絕望，找到人生均衡的「中庸」和想要對家族負責到底的「溫情」)。這樣的現象就像余華所說，是李光頭選擇的結果。但是作者的寫作方式與以往的小說有所不同，這也是不可忽視的。如果余華站在他以往的寫作方式的立場上來對待改革開放的問題，也許就會是這樣的情景：即經歷文革的「許三觀的兒子世代」變成農民工到城市以後，雖然在那裏經受着社會的不平等待遇，忍受着對家鄉的思念的煎熬，卻絕不灰心，繼續尋找人生的希望。就算通過這樣的故事，也可以展示余華所意圖表現的改革開放以後造成的巨大間隙。

但是余華選擇了不同的寫作方式。他通過所謂「狂歡」敘事，不但描寫了熱衷於對物質和性欲的渴求，而且讓生活裏的「中庸」不復存在，讓人們眼前看到的只有自身的生存，讓一個人對家族和他人的一點點溫情也給拋棄了。余華寫完《兄弟》後，接受陳思和的意見，把這種寫作稱為拉伯雷式方式。但是《兄弟》跟拉伯雷的作品世界始終不

同。雖然在毫無掩飾地描繪物欲和性欲上，它們存在着相似之處，可是拉伯雷描寫的是中世紀的禁欲制度下壓抑的本性被解放出來的故事；相反，《兄弟》裏反映的是狂歡的社會故事，這一點上，它們有着不同的立場。還有，拉伯雷的《巨人傳》裏描寫的巨人們不止是身材上的巨大，精神上也具備了巨人的氣質。我們可以從給喝醉酒睡着了的酒鬼嘴裏撒鹽這個情節上看出，作者賦予巨人龐大古埃 (Pantagruel) 一個能夠支配那些口渴的人的形象。巨人龐大古埃其實是中世紀傳說裏一個魔鬼的化身，在他身上隱含着特別的象徵意義。這種口渴症有着享受更好生活的欲望，期待人間無限的可能性的含義。可以說這種含義裏的巨人們是時代所期望的理想化的人物模型，即在各個方面都能發揮出超能力的完人形象。

《兄弟》裏的李光頭雖然在商業手段和性欲方面有着和巨人差不多的超人能力，但是在精神方面他是一個俗人，跟擁有文藝復興時期的理想價值的拉伯雷的巨人們無法比較。實際上，《兄弟》裏的改革開放時代不但沒有出現理想的人物，而且連暗示未來希望的小孩也沒有出現過。像李光頭，他做了輸精管手術，喪失了生殖能力，而宋鋼和林紅之間也沒有孩子出生。從這一點看，可以說《兄弟》是一部世態小說，敘述家族瓦解後沒有後代來繼承的絕望而墮落的社會，而拉伯雷的小說是追求文藝復興時期的人的可能性的理想小說。因此，我們看出兩部小說呈現的是完全不同的景象。

那麼，余華選擇的這種新的敘事方式，對他本人所想揭示的中國社會的巨大間隙，能起到有效的作用嗎？當然用以往的中庸和溫情的敘事來揭露巨大間隙的真相，那只能受到限制。因為在余華以往的小說裏，專制壓抑的現實都是用象徵的背景來處理的，主人公以中庸和溫情的精神態度去適應那樣的環境，尋找生存意義的過程成為作者敘事的中心。但是在《兄弟》中，余華直接揭發社會不平等的實體，嘗試了與以往的小說不同的敘事方式。很明顯，這一點對余華來說算是一個新的挑戰，是為拓展自己的想像世界作出的一個試驗。

在這裏，如果問到余華的試驗結果，筆者的回答不會是那麼肯定的。如果要體現巨大間隙的實體，應該兼備揭露中國社會內部隱蔽的總體的認識，以及與挑出來的矛盾進行肉搏戰，然後撒在地面上的戰鬥的想像力。但余華選擇的狂歡敘事沒有達到這種均衡的省察。對導致社會不平等的國家—資本的結構、對社會弱者的政策與制度的空白、中國人旁觀者的本質等問題，缺乏必要的審視。小說只是刻畫了個人的能力和性格差異，以及道德和倫理意識的喪失。在社會全體狂歡的時代中揭露物質欲望並不陌生，甚至接近於現實的直接引用，因此余華停留在世態的想像力的批判也是可能的。筆者認為，對社會資源的不均等分配和導致個人的生活不穩定且墮落的根本原因的洞察，比對大眾渴求物質欲望的洞察更為切實。也就是說，超越體現欲望本身，只有揭發欲望與制度的

在《兄弟》中，余華直接揭發社會不平等的實體，嘗試了與以往的小說不同的敘事方式。很明顯，這一點對余華來說算是一個新的挑戰，是為拓展自己的想像世界作出的一個試驗。

余華的新挑戰還處在冷笑和諷刺之間。將來余華挑戰的成敗與否，有賴於他在改革開放的現實上怎樣結合魯迅意義上的諷刺和拉伯雷意義上的理想。到那時候才能完全打開《兄弟》無法打開的中國社會的潘多拉盒子。

相關性，才能接近這一巨大間隙的實體。

狂歡敘事最終只能讓人對絕望的社會報以冷笑，因為小說中所有人物在忘卻人生的意義、沉浸歡樂之中的情況下（特別是改革開方時代），不可能對未來抱有希望。冷笑對絕望的現實提供了優越的快感，但是無法對絕望的現實加以冷靜的認識和抵抗。這個時代需要的不是冷笑的文章，而是諷刺的寫作。所謂諷刺就是深深地投入到社會結構裏，揭露社會頹廢腐敗的原因，拿着與之對抗的鋒矛，摧毀整個結構，把腐爛在裏面的分泌物都撒到地面上的寫作方法。即使理想人物沒有直接的出現，也會開出可以直視現實的路，在這個意義上，這種寫作本身是抱有希望的。

筆者認為，余華的新挑戰還處在冷笑和諷刺之間。將來余華挑戰的成敗與否，有賴於他在改革開放的現實上怎樣結合魯迅意義上的諷刺和拉伯雷意義上的理想。到那時候才能完全打開《兄弟》無法打開的中國社會的潘多拉盒子。

註釋

① 《兄弟》上、下部於2005至2006年在中國出版。在韓國2007年被崔容萬翻譯成三卷於人文出版社出版。

②⑤ 陳思和：〈我對《兄弟》的解讀〉，《文藝爭鳴》，2007年第2期，頁55-64。

③⑭⑮⑯ 余華著，崔容萬譯：《余華的〈兄弟〉作家筆記》，韓文本（首爾：人文出版社，2007），頁12；52；13；40。

④ 陳思和：〈從巴赫金的民間理論看《兄弟》的民間敘事〉，載《當代小說閱讀五種》（香港：三聯書店，2009），頁98-103。

⑥ 參見潘盛：〈綜述：關於《兄弟》的批評意見〉，《文藝爭鳴》，2007年第2期，頁102-105。

⑦ 改革開放以後，關於中國消費大眾的登場以及消費文化「狂歡」性，參見孟繁華：《眾神狂歡：當代中國的文化衝突問題》（北京：今日中國出版社，1997），頁62-67。

⑧ 關於魯迅批判的中國人的國民性與旁觀者性格，參見李琮敏：《讀近代中國的文學的思維》，韓文本（首爾：召命出版社，2004），第六章。

⑨ 「李光頭拆掉了舊劉鎮，建起了新劉鎮。也就是五年時間，大街寬廣了，小巷也寬敞了，一幢幢新樓房拔地而起，……李光頭為我們劉鎮群眾從吃到穿，從住到用，從生到死，提供了托拉斯一條龍服務。誰都不知道他做的生意究竟有多少？誰也不知道他一年究竟掙多少？」余華：《兄弟》，下部，頁247-48。

⑩ 「廢品西服象徵着中國1980年代，美人大會象徵着1990年代。廢品西服的流行是我經歷過的1980年代的中國社會風景。因流通廢品西服成為百萬富翁的人，在中國實際存在。曾經在*Forbes*中因廢品致富的人，被選拔為話題人物第一名。」余華：《余華的〈兄弟〉作家筆記》，頁47。

⑪ 李旭淵：〈走向世界的余華文學之路〉，載余華：《余華的〈兄弟〉作家筆記》，頁63。

⑫ 《兄弟》，下部，頁247-48描寫了李光頭成為劉鎮的大亨後，緊接着在頁249描寫了宋鋼在金屬工廠倒閉後淪為失業人員。

⑬ 余華：〈給韓國的讀者們〉，載《兄弟》，韓文本，第一卷，頁5。

李琮敏 韓國慶星大學中文系教授，
香港嶺南大學訪問學者。